

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视角下的龟兹乐舞

何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这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我国各民族文化都提供了丰厚滋养，其中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是生动的案例。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有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势力最大，辖境包括今天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地，人口达8万余人。张骞凿通西域后，龟兹与中原交往加深。公元前66年，龟兹王绛宾迎娶汉昭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为妻。翌年，二人入长安，居留达一年之久。汉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回到龟兹后，他们大力推行汉朝的制度和文，国王及大臣皆佩戴汉印绶，以汉朝臣属自居。公元前60年，汉宣帝置西域都护，治所设在龟兹辖境的乌垒，开始对西域行使管辖权，标志着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东汉班超定西域，设都护府于龟兹之它乾城。曹魏、西晋皆对龟兹实施有效管辖。南北朝至隋，龟兹先后依附前凉、前秦、后凉、柔然、北凉、北魏等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有唐一代，龟兹是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绝大多时间也是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太宗朝及高宗朝，几代龟兹王还被任命为龟兹都督府的都督。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西域与中原隔绝。大约在北宋中后期，龟兹被喀喇汗王朝兼并。南宋经元到明，龟兹一带先后被西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统治。清代统一西域后，1758年改龟兹为库车。

龟兹地处塔克拉玛干最大绿洲和丝绸之路要冲，地理位置优越，是汉唐文明和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等文明的交汇地，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中最具影响的除了佛教文化，就是乐舞艺术。

龟兹乐舞是西域乐舞艺术的代表，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屈支（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现存的龟兹壁画中，音乐舞蹈形象比比皆是。乐器中既有龟兹本土的五弦琵琶、羯鼓、鼙鼓，也有中原的排箫、笙，还有波斯、印度的竖箜篌、贝鼈，等等，充分反映出龟兹乐舞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龟兹乐舞的东渐始于西汉。《晋书·乐志》记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

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有学者指出，龟兹乐即是《摩诃兜勒》曲的滥觞。汉宣帝到汉哀帝，几代龟兹王多次入长安，在学习汉朝典章制度、礼乐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原带来了更多的龟兹艺术。所以北宋诗人沈辽说“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人乐府”。382年至384年，前秦大将吕光征龟兹，带回大批龟兹乐师和十种乐器。吕光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后，把大量龟兹乐加以改编，糅合当地音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凉乐”。北魏统一北方，龟兹乐开始在中原盛行。北周至隋唐，从宫廷到民间，龟兹乐大行其道。隋代九部乐中，外族音乐三十九曲，龟兹乐占二十部。唐代十部乐中，龟兹乐器最为丰富。唐玄宗改十部乐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八种立部伎中有五种采用龟兹乐，六种坐部伎中有三种采用龟兹乐。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以至于出现了“逖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元稹《连昌宫词》）的盛况。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就融入了龟兹乐舞的不少元素。唐玄宗能熟练演奏《耶婆瑟鸡》等龟兹羯鼓曲，宴会时还经常亲自击鼓以助兴。

龟兹乐舞在与中原乐舞交流过程中，在吸收中原艺术精华、丰富和发展自身艺术的同时，也为中原乐舞补充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原艺术的革新。

龟兹大音乐家苏祇婆，是我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568年，苏祇婆随阿史那公主入嫁北周都城长安，任周武帝乐府教习。由北周入隋，苏祇婆和音乐家郑译合作，将龟兹的“五旦七声”与中原十二律相结合，创立了“旋宫八十四调”，因来自苏祇婆琵琶所授，所以又称“苏祇婆琵琶八十四调”。这套宫调音乐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我国古代音乐调式的规范，也奠定了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对后世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龟兹乐的传入，促进了中原乐器的改革，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乐器，如管子（即篳篥）、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琵琶，随着八十四调的推广，从隋唐开始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

龟兹乐舞对我国戏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准备期，当时流行的歌舞戏已

具备戏剧的雏形。著名的歌舞戏有踏踏娘、苏幕遮、大面、拨头、浑脱等。除了踏踏娘，其他均出自龟兹或经由龟兹传入。而且据王国维考证，踏踏娘恐怕也是受到了拨头等的影响。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摩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旧唐书·音乐志》说：“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进一步说“钵头”（即拨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明显已具备“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特征。这些来自龟兹的歌舞戏，连同中原自身的歌舞戏、参军戏，共同为我国戏剧艺术登上历史舞台奏响了开场锣鼓。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内地流行的狮舞表演与龟兹的五方狮子舞应该有着莫大渊源。

唐代国力强盛，一时间出现了四夷宾服、八方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龟兹乐舞除了在中原、吐蕃、南诏等地流传，也经由朝廷的弘杨远播域外。朝鲜半岛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日本至今尚有《拨头舞乐》。日本的雅乐里，有许多与龟兹有关的乐曲，龟兹乐中的鼙鼓、五弦琵琶等已成为日本的传统乐器。越南、缅甸等国的乐舞艺术，也深受龟兹影响。缅甸宫廷乐部有四部，第一部即“龟兹部”，其乐器配置与唐“龟兹部”完全一致。

南北朝到隋唐，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几百年间，从贵族到平民，不断有龟兹人内迁，推动了龟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有研究者指出，1952年在西安东郊发现的唐代苏思勖墓壁画上的乐队演奏图，实际上就是龟兹乐队的缩影。现在陕西关中等地还把民间从事红白喜事表演的艺人叫龟兹（guī zī，把龟兹念作guī zī，当是民间读音之误），演出班子叫“龟兹班”，可以看作是龟兹乐在内地流传的有力佐证。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正如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祖先的基因一样，我们的文化里也饱含着各民族古老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探访清永陵

庄电一

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是清朝，在历朝历代的皇陵中，保存最好的帝王陵寝也是清朝。说起清朝的帝陵，位于河北省境内的清东陵、清西陵，都已广为人知。现在也都成了旅游的热点，但知道关外三陵的人不多，闻所未闻的也不在少数，而一座不落、实地踏访的人就更少了。

所谓的关外三陵，是指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后的昭陵（北陵）、清朝皇帝祖陵的清永陵（另有关外四陵之说，即上述三陵之外再加上埋葬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其长子褚英、庶母弟穆尔哈齐及其子大尔盖的东京陵，2013年，东京陵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关外三陵中，福陵、昭陵因在沈阳市境内，又因努尔哈赤和皇太后的名气大，所以光顾的人比较多，给人的感觉也不那么神秘，但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清永陵，却因光顾的人太少而弥漫着神秘色彩。

清永陵，作为清朝皇帝的祖陵，兴建时间最早、所处地位也最高，因为它在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前就已存在了。作为清朝的所谓“龙兴之地”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清永陵不仅被满清统治者视为圣地，而且被文物管理部门重视。1988年，清永陵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更与清福陵、清昭陵一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说起来，我有点孤陋寡闻。此前，我曾看

过位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对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也有了解，但对清永陵一直不甚了了，在最近的实地踏访之后，我才基本弄清其来龙去脉。

那一天，我从沈阳出发，经抚顺进入其所辖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里有名胜古迹。在行进中，猛然看到路口一块横卧的石头上面刻着“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几个大字，马上就来了兴致。

一进入陵区，就看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买好了门票，来到正红门，穿过独具满族特色的木栅栏大门，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皇家陵园便进入了眼帘。

依山傍水，布局严谨，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的清永陵，给人以古朴、典雅的印象。它借鉴了中原帝陵在陵前设享殿、后为陵寝，周以方垣、均衡对称的陵寝体制，但在建筑形式、布局、造型、工艺上又有自己的建筑特点和艺术特色。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座重要的帝陵，虽然所用的是只有皇家才可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有完整的长方形陵墙，但其规模却不大，与“雄伟壮观”“气度不凡”也不沾边。一般帝陵都有的石牌坊、石像生和明楼，这里都没有了。

距正红门最近的建筑，是并排而立的四座碑楼，其格局几乎完全相同，碑楼只开前后两道门，拱形门外面均有精美的石雕。四座碑楼自左至右分别是显祖、兴祖、肇祖、景祖。努尔哈赤的这四位祖先，生前均没有当过皇帝，所有封号均是入主中原后追封的。四座碑楼内均立有高大的石碑，石碑上均刻有碑文。与清东陵、清西陵的碑文只所用满、汉两种文字有所不同，这里的碑文刻有满、蒙、汉三种文字。

在四座碑楼之后是启运门，启运门两侧有砖雕，雕刻有五彩云龙。启运门之后便是启运殿。在清代的其他帝陵中，这个大门均被称作“隆恩门”，其后的大殿被称作“隆恩殿”，只有永陵将这个大门称作“启运门”，将其后的

大殿称作“启运殿”，据说有清帝国的好运从这里开始之意。

启运殿，是清永陵中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里面摆满清帝祖先的灵位和各种祭祀物品。启运殿的后面，也就是永陵的顶端，则是清帝祖先的长眠之地。耐人寻味的是，这里居然是一陵多葬、君臣共葬。在狭小的空间里，分别埋葬着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其嫡福晋，此外还埋葬着努尔哈赤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的陵寝，竟然都是不起眼的小土堆，它们方圆有几米，高都没有超过一米，且都没有宝顶、没有墓碑，均为茂盛的高草所覆盖，与年深日久的普通百姓墓葬相比几乎没有区别。当时，满族盛行火葬，所以这里埋葬的是他们的骨灰。

清永陵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后天聪八年（1634）称“兴京陵”，清顺治十六年（1659）才尊为“永陵”，寓意为大清王朝“江山永固”。顺治十年（1653），清永陵开始设官兵守护，民国11年（1922年），永陵总管及掌关防衙门被裁撤，改由兴京县公署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永陵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清朝皇帝也不例外。为了铭记祖先的恩德和贡献，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敬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先后九次到永陵祭祖。其中，康熙来了3次，乾隆来了4次。每次祭祖，都是兴师动众，耗费巨资，延宕多日，足见清代统治者对祭祖活动的重视程度。

现在的清永陵，略显冷清、落寞。我进入陵园参观时，在园内参观的人很少，总共也未超过10人，这与它的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很不相称。我去游览时，有位在清东陵工作的专业人员也来游览，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相关知识，热情地为游客当起了义务讲解员，有几个游客紧随其后，兴致勃勃地聆听，激起了他解说的积极性，有人还对他的解说进行了全程录像。由此可以看出，大家都对相关历史知识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也说明，清永陵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也是值得探访和深入了解的。虽然这里门庭冷落现状是多方面的，但我相信，这种局面一定会有所改观，毕竟，它的价值和魅力是独有的。

激活红河哈尼梯田的遗产价值

张红榛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是红河南岸哀牢山余脉以哈尼族、彝族等世居民族利用当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地理气候，发挥聪明才智同耕共创的近百万亩梯田农耕文明生态奇观。

红河哈尼梯田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处的模式，展现了当地民族的生存智慧，为人类不同群体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和谐样本，体现了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201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是为现存的或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见证，是人类聚居、土地利用的杰出范例。其完美地反映了精密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分配系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模式。”

精妙良性的农耕系统

红河哈尼梯田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景观壮丽，绵延红河南岸哀牢山区。据汉文史料记载，哈尼梯田具有1300多年以上的开垦历史，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将梯田列入中国古代七大田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红河州内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县梯田面积达82万亩，加上玉溪元江、普洱墨江、江城等地的梯田，达上百万亩，成为撼人心魄的世界奇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这片山高密林的土地上，当地民族认为人的命根子是田，田的命根子是水，水的命根子是森林和树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他们把云雾当作空中大海，森林看作是绿色水库。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季风性气候给哀牢山区的密林带来了储量丰富的雨水，他们巧妙利用，顺势而为，拦截成大大小小的塘坝沟渠，再引入村寨流到梯田，梯田上满下流，层层叠叠，最后汇入红河。低海拔的河水受高温影响又形成雾气蒸腾到高山，在高山拔山顶遇到冷空气凝结成水珠落到森林，再流到地下沙兜里慢慢渗出，顺流而下，如此循环反复，成就了人与自然共创的良性循环农业生态系统。

梯田农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分工明确的资源管理系统。在长期的梯田垦殖中当地人独创了基于自然的高山冲肥法、木刻分水法、精细的田间管理技术、自留稻种储藏技术、稻鱼鸭复合共生等生态农业绝技，族群内部春耕秋收、红白喜事等重大事项互帮互助的村规民约，确保了梯田四季农耕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

当地人民在选择村寨住址时，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挑选出温暖、向阳、有山有水的半山腰作为建寨的理想地点，营造出村寨的上方有茂密的寨林树、村边有水碾水井、村脚有磨秋场、村中的民居有祖宗神龛。其传统民居是就地取材的土建筑——石基、土墙、木格、草顶的蘑菇房，自然古朴，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传统民居为两层半，过去一二楼住牛马等牲畜，认为牛是天赐的农耕助手，要爱护善待，同住一个屋檐下相依为命；二楼住家人，同时设祖宗神龛和永不熄灭的火塘，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祖祖宗，追思怀古，祈求护佑子孙后代；冬暖夏凉、通风透气的三楼堆放粮食食物和种子。屋外的晒台用于晾晒粮食，也是妇女做针线活或家人聊天晒太阳的场所，是与大自然连接的重要活动空间。如果说梯田是景观的重点，而村寨则是创造这一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家园。

高山、流水、梯田、人家，不仅是诗意的栖居，而且是科学合理的人居选择，建立了适应农耕生产生活的可持续祭祀活动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系统。

和谐共居的美好家园

在红河南岸，哈尼梯田境内世居民族共耕共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哈尼族、彝族、傣族、苗族、瑶族、壮族、汉族分布在不同的等高线上，形成大杂居、小聚集的互嵌式工具模式。高山密林中的瑶族、低海拔坝区的傣族、半山腰上的哈尼族、彝族等世居民族通过劳动互助、结亲通婚、贸易互通等方式加以联系，相互交往，真诚以待，相互交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民族生活空间。比如，在红河南岸至今还流行赶不同的十二生肖街子，不同村寨错时在



集市上交换诸如高山木耳香菇、半山稻鱼、河坝芒果、香蕉等梯田生态系统产品，以及哈尼族梯田农耕铁具、傣族土陶、彝族刺绣、汉族的小吃等特色商品，各取所需，产品互补。在哈尼族昂玛突节、苦扎扎六月节、十月年、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傣族泼水节，各民族走亲访友，参与体验不同民族节日，以美食为媒，文化互赏，共享欢乐，增进友谊。民间有句俗语：“哈尼哈哩其玛然，阿赤腊批其泡同”，意思就是哈尼族彝族是一娘生的，盐巴、辣椒是包在一起的，形容亲如一家。高山哈尼族和低海拔坝区的傣族历来有搭“牛亲家”的习俗，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资源缺乏，哈尼族和傣族利用气候差异的特点共管共享耕牛这一宝贵的生产资源，并因此而结成亲如一家的“牛亲家”关系。哈尼族和邻村邻寨的彝族壮族，也会有缘结成牛马亲家，春耕秋收插秧打谷重要农活互相帮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交通改善，牛马已经不再是紧缺生产资源，但牛马亲家的亲密关系依然存在，亲家后代继续往来的不在少数。另外，在民间还普遍流行各种“亲家”关系，如同族之间或不同民族之间儿女通婚结成的亲家、给好朋友儿女拜干爹取名结成的拟亲家、梯田劳动帮扶结成友谊的亲家，给孩子祈福搭桥立碑路遇被认作干爹的亲家等等，这些各种缘分达成的“亲家”关系一旦确立，不分民族，彼此之间就达成了深度交往亲如一家的好朋友，在春耕秋收、盖房起屋、红白喜事等重大事情履行互帮互助的责任和义务。这些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平等、尊重、包容、互信、互利的民间交往规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风尚，形成人心相通、情感交融的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关乎未来的活态遗产

红河哈尼梯田不仅为境内上百万世居民族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生计，同时在保水保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区域性担当。当地人民基于对自然敬畏和形成的譬如绿色低碳的劳作方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春耕秋收冬闲的土地适度利用制度、自然的农家施肥法、稻鱼鸭共生的农业复合系统，这一系列传统农耕方式产出的稻鱼菜等梯田生态系统产品，成为当今人们追求营养丰富、健康环保的绿色食品。

红河哈尼梯田除荣获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桂冠外，还先后被列入国家湿地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二批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实践基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等。域内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红河乐作舞、四季生产调、哈尼哈巴、多声部民歌、祭寨神林、苦扎扎（六月年）、都玛筒收等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基于绿水青山的梯田生态系统产品开发、传统文化展示、对外交流活动也是风生水起，开辟了后申遗时代保护传承的新篇章。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是人与自然共创的杰作，更是关乎未来的文化遗产，申遗十多年来在保护发展的道路上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要系统挖掘和认知遗产文化内涵和多重价值，加强公众世界遗产教育，开展多形式的展示和阐释，讲好中国故事；擦亮世界遗产品牌，赋能梯田产业发展，在农产品包装、文创产品设计、旅游产品开发上用品牌提升价值，从而惠及各族百姓。

红河哈尼梯田是祖宗留下来的爱与智慧的礼物，是宝贵的资源财富和关乎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将长期、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惠及当地各族百姓，惠及子孙后代。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联系人：张磊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扫描下方二维码 官方网站	扫描下方二维码 官方微信